

# 元诗史

杨  
镰  
著

薛都刺《秋夜闻笛》  
亦有江南未归客，徘徊终夜倚阑干。  
吴姬水调新腔改，马上郎君好风采。

孙云春草深，漫有狂名满江海。  
破峨眉月，我亦东西南北征。



杨  
镰  
著

# 元诗史

萨都刺《秋夜闻笛》

何人吹笛秋风外，北固山前月色寒。  
亦有江南未归客，徘徊终夜倚阑干。

吴姬水调新腔改，马上郎君好风采。

春草深，漫有狂名满江海。  
江上亭，墨花飞雨江不晴。

蛾眉月，我亦东西南北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诗史/杨镰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02-004237-6

I . 元… II . 杨… III . 诗歌史 - 中国 - 元代  
IV .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0342 号

责任校对: 杜维沫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元诗史

Yuan Shi Shi

杨 镰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2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237-6/I·3217

定价 42.00 元

# 目 录

<b>第一卷 引 论</b> .....	1
第一章 元代历史与文学 .....	2
第二章 元诗概观 .....	27
第三章 元诗文献 .....	36
第四章 元代诗学 .....	60
<b>第二卷 蒙古色目诗人</b> .....	67
第一章 元诗坛的新群体 .....	69
第二章 蒙古诗人 .....	89
第三章 馆阁名臣马祖常与也里可温 .....	103
第四章 贯云石与回鹘诗人 .....	118
第五章 元诗冠冕萨都刺 .....	134
第六章 “最后的”色目诗人：金元素、迺贤 .....	149
第七章 元明易代之际 .....	174
第八章 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历史命运 .....	210
<b>第三卷 北方诗人</b> .....	215
第一章 元好问与金遗民诗人 .....	222
第二章 主流诗人耶律楚材 .....	238
第三章 纵横天下 ——刘秉忠·郝经·张弘范·郭昂 .....	255

第四章	诗人—理学家	273
第五章	文臣之诗 ——王恽·姚燧·刘敏中·王士熙·张养浩	285
第六章	“大隐”之诗	300
第七章	宋本兄弟·许有壬·张翥	308
第八章	元代诗坛的南北分合	327
 <b>第四卷 南方诗人</b>		 333
第一章	从江南开始	337
第二章	前期文臣	382
第三章	诗人—学者	411
第四章	隐士与苦吟诗人	432
第五章	元诗“四大家”	459
第六章	后期文臣中的诗人	484
第七章	诗坛盟主:杨维桢与顾瑛	506
第八章	南方诗人在元明之间 上 赴难诗人	531 534
	中 避难诗人	562
	下 述难诗人	584
第九章	江南地方诗坛 江西	604 607
	福建	610
	鄱阳	614
	睦州	616
	天台	618
	宣城	621
第十章	同题集咏	624

一	月泉吟社咏“春日田园”.....	626
二	咏物诗.....	632
三	西湖竹枝词.....	639
四	宫词与上京纪游诗.....	643
五	咏梅.....	651
第十一章	元诗终结.....	657
 第五卷 释道诗人 .....		661
第一章	江湖派影响下的元前期僧诗.....	665
第二章	诗僧在元后期.....	679
第三章	丘处机与前期道诗.....	699
第四章	张雨与后期道诗.....	715
结	语 .....	727

# 第一卷 引 论



# 第一章 元代历史与文学

元是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封建王朝。

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个梯次出现的西北古族,比如匈奴、乌孙、鲜卑,经过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逐渐从历史的前排位置淡出;准备还不充分的第二梯次民族,比方蒙古、回鹘、西夏等,随即凸显在旋转舞台的前台。各民族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阴山《敕勒歌》唱遍北方草原,已经开始销歇时,蒙古人就游牧在苍莽天穹之下,没人的牧草之中了。他们的居住形式在十几个世纪之间没有实质的改变,因为“蒙古包”已经成了象征,象征“笼盖四野”的苍穹对蒙古人的庇荫与恩宠。他们几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

在历史上,蒙古族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成吉思汗;最成功的实践之一是建成元朝。

公元 1162 年,是南宋第一个君主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十二年。上一年,来势汹汹的金主完颜亮本来意欲一鼓作气占领江南,却在兵变之中为部将所杀。至此,宋与金的南北对峙格局终于稳定下来。当了 36 年皇帝几乎没有一天过得安稳,到这时宋高宗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他宣布退位,由嗣子赵眘即位,是为孝宗。就在这 1162 年,漠北草原的一条内陆河——斡难河河畔的蒙古乞颜部落的留守营地,一个“手握凝血如赤石”(《元史·太祖本纪》)的婴儿出生了。这婴儿的父亲是部落酋长也速该。正与宿敌塔塔儿部做生死搏杀的也速该,便以刚

刚俘获的塔塔儿部领主铁木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而这个乞颜部的铁木真，日后正是金、南宋这两个敌国国无宁日的根源。1206年，又是在斡难河的河源，用前半生统一了蒙古诸部的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共同的宗主，号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后半生，将横扫欧亚大陆。1227年，成吉思汗死于攻掠西夏的过程中。他的继承人窝阔台于1234年灭掉世仇金。元朝的奠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哥哥蒙哥汗在出征南宋时死于合州钓鱼城下的行营，忽必烈即位，并稳固了“后院”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谋划攻占江南。事实上，当时蒙古的敌手也只剩下了热衷歌舞升平的南宋。

忽必烈即位就采用了中原王朝以往的惯例，以“中统”作年号。中统五年(1264)又改元至元。至元八年(1271)，采纳了汉人谋士刘秉忠建议，以“大元”为国号。在采用“大元”国号之前，使用过“蒙古国”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以“蒙古国”自称的，还有明清之际中亚(新疆)的一个王国——叶尔羌汗国<sup>①</sup>。至元十六年(1279)，江南最终归入版图。元成了统一中国的王朝之一。元立国时间并不长久，传了九位君主、统一中国不足九十年，就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为明所取代。明朝大军兵临大都城下，及时退往漠北故地的元顺帝仍然保留了帝位，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与明朝为敌国的新的南北对抗的局势，历来史家习惯称呼退出大都(即今北京)后的蒙古为“北元”，由于北元历史短暂，避处漠北，今天人们对这个名词已经不大熟悉。在明朝，西部嘉峪关外的哈密王国、吐鲁番王国，虽然都是蒙古馀胤，

<sup>①</sup> 蒙古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1514—1680)，以塔里木的喀什噶尔(即今喀什)、叶尔羌(即今莎车)为中心。它的国名是“蒙古国”，“叶尔羌汗国”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虽然终于明，雄踞漠北的蒙古部落瓦剌使北部边境的压力难以息肩，但蒙古族最终还原成为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而这里所说的元，主要就是指统一了中国的封建王朝而言的。元代文学，是这一时期之内的文学。元诗，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史家往往对元有所忽视。《元史》被认为是中国正史草率成篇的例证。但实际一些篇幅更大的史书比如《宋史》、《清史稿》，比之《元史》问题更复杂。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由于蒙元对世界史的巨大影响，学者们也给以元史更多的关注。近代大史学家和文史专家们，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等，都曾特别致力于元史的研究。而今天，元史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显学。

作为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之一，元突出的特点是，立国时间短；控制疆域大。在汉、唐、宋、元、明、清等王朝之间，元代经历时间最短，仅有八九十年，但它的实际领有的国土，则是世界历史之最：横跨欧亚大陆。当然，在统一王朝之中，元的国运不是最短的，更短的是秦、隋。这只是与唐、宋、明、清比较而言。

作为第一个由汉族以外的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全国的王朝，它为历史提供了特殊的范例。据至元八年刘秉忠建议，元朝的全称便叫做“大元”。中国以前的王朝在国号之前没有特意加上“大”的先例，有，那往往是臣子或属国的敬称。“元”，则是取《易》“大哉乾元”之意，着眼点是那个“大”字。在以大元为国号之前，蒙古汗庭自称为“大朝”或“大蒙古国”，那一时期所铸造并行用的货币便以“大朝通宝”<sup>①</sup> 为铭文。实际使用“大元”为国

---

<sup>①</sup> 有铜、银两种质地的“大朝通宝”钱币流传至今。由于当时中亚有使用银币的习惯，银“大朝通宝”可能主要是用于中亚贸易。据记载，在相当于北宋的时期，另有“大朝金合”铜钱流通，它也许是蒙古早期之物，或是辽金等北方民族所使用。

号,始于至元八年(1271)的十一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的一个元代古塔内曾发现了一则墨书题记,写道:“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sup>①</sup> 这便是在至元八年十一月之前,实际使用“大朝”为蒙古国国号的实例。“大朝”立足仍然是一个“大”。按元朝惯例,在每年元旦朝会要演唱一支[新水令]曲助兴。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旦的[新水令],是祖籍高昌回鹘王国的贯云石填词,他的第一句就是“大元至大古今无”。这“至大”是双重含义,即是新的年号,也是颂词。大元至大,确实是世界、古今所无。当然,不是在大元,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王朝也不会由一个“小北庭人”做当行的作家<sup>②</sup>,写出朝会的“无伴奏合唱”唱词。

1986年,新疆且末县的塔他浪古城出土了一批元代文书残片,比较完整的是4件。内容相当丰富,其中除了契约、信件或官方文书(没有宗教文献),还有手抄的词曲。据同一地点出土的军人名册,戍守在塔他浪古城的军人来自陕西延安府的延长、肤施(延安县古称)两县。而这两个县原来都在金朝治下。据出土文书可知,塔他浪古城曾扼守东西交通的要冲,是元代穿越车尔臣区域必经的咽喉要道。但那个古城如今已经身处沙漠之中,远离绿洲,附近也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居住遗址。文书上抄的词曲一部分是《董解元西厢记》,还有几首则始终未能判断出是

---

① 史金波等《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413。这则题记末尾有残缺。

② 据欧阳玄《贯公神道碑》(《圭斋集》卷九),忽必烈在一次庆功宴会上,直接称呼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为“小北庭人”。北庭古城,在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但这里的“北庭”,指高昌回鹘王国,它的首府在新疆吐鲁番。元朝人居中原的回鹘人,一般都以“北庭”或“高昌”为籍贯(郡望)。

否是今存的元曲、元词抑或其他作品<sup>①</sup>，所以不能排除是来自延安府的卒自己所写的诗歌。这虽然还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但对元代文学却具有特殊意义。首先，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从金源流传到新疆且末，除了在大一统的元，其他朝代绝无可能；其次，通过这一范例对元代普通人（特指充军塞外的军士）的业余生活——从层次到内容——有了实质的认知。文明、文化，进而说文学，在元代随着疆域空前扩张，也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交流机会。塔他浪古城同时出土的文书有至元二十年（1283）和二十一年的纪年。这些文书无疑是元代前期的遗存。这，大概就是同一时期汉语文献出土的最西极限。

元人孔齐《至正直记》，记载过比且末古城更遥远的中亚铁门的一首元人题词。铁门，即铁门关<sup>②</sup>，是西域古地，故址在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捷尔宾特城以西十馀公里处。玄奘西行取经时曾经此前往印度。成吉思汗经略西域，为征讨花刺子模国，也曾路经。《至正直记》卷一“古阳关”说，据《和林志》记载，铁门“其门石壁凌云，上有镌字曰‘古阳关’”，并题有一首〔青门引〕：

凭雁书迟，化蝶梦速，家遥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欢呼，  
细君迎迓，拭去故袍尘帽。问我假使万里封侯，何如归早？  
时运且宜斟酌，富贵功名，造求非道。靖节田园，子真岩谷，  
好记古人真乐。此言良可取，被驴嘶恍然惊觉。起来时，欲  
话无人，赋与黄沙衰草。

---

① 参见何德修《沙海遗书——论新发现的〈董西厢〉残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② 见《新疆历史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535 页。今之新疆库尔勒市郊有一个“铁门关”，但它肯定不是玄奘及成吉思汗曾路经之处。唐代大诗人岑参从军西域时写有铁门关纪游诗，他路经的是哪个铁门关，尚无定论。

这大概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最：写作地点距中原最远的汉语纪游纪梦之作。孔齐大概也为其感到奇怪，说“不知何人所作也”。它无疑是元代路经者的题词。也许就是成吉思汗军中的汉人或用汉语写作的蒙古色目人信手所写，并铭壁志感。除元代，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王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玄奘路经时在唐初，那时还没有词曲等文体。而且这首〔青门引〕的境界，也非常人不能道。

因为实际占有的领土如此广大，所以元代的用汉语写作的文坛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文坛。元代文学家的籍贯中出现了“白野”“拂林”“北庭”“高昌”“于阗”“龟兹”“唐兀”等地域。元代有个用汉文写作的西域诗人名叫“五十四”，他自署“高昌五十四”，但到清朝中期编辑《元诗选粹集》时，编者一时想不起“高昌”为何地，竟臆改为“南昌五十四”<sup>①</sup>。同时还出现了以“大食”“康里”为复姓（如同“西门”“东郭”等等）的诗人作家，比如大食惟寅、大食哲马；康里不花（康里百花）。大食，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康里故地，在乌拉尔河到咸海东北。

人们注意到，中国历史有两个特殊的情况。一个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予以讨论的。195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清指出：“在一个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历史里最有趣的一致性是……汉唐这两个伟大皇朝开始前，都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即秦与隋。”同时费正清进一步指出：“学者们为汉唐两朝的这种类似现象所吸引，曾试图提出种种不同的循环

---

<sup>①</sup> 在民间，自古就有以出生时父亲与母亲年龄的总和作为名字的习俗。除五十四，在元代蒙古色目人之中还有叫做“六十一”之类名字的元人；而镇海之孙名为“八十八”，沙剌班之弟则叫“六十”（前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2267页，后见2447页）。今存五十四诗，出自明人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是《卢贤母传》的题诗。

理论。”<sup>①</sup>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规律,似乎没有人进行追踪研究。而费正清未曾涉及的是,在秦与汉、隋与唐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第三个循环,即元与明清。秦、隋、元都是使用了超级武力,强行统一了长期分治的中国,但都未得久长。如果就这一命题进一步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朝代的“循环”有延长的趋势:就它们统一中国的时间而言,秦,16 年(公元前 221—前 206);隋,30 年(公元 589—618);元,89 年(公元 1279—1368)。这一“延长”似乎是递次增长着( $\times 1, \times 2, \times 3$ ),它们的近似值是  $15(16) \times 2 = 30; 30 \times 3 = 90(89)$ 。就费正清特意提出的这个“一致性”的背景作深入探讨,是另一个课题。但这个“一致性”至少可以说明,元朝正好处于唐宋与明清两个历史时期之间。——这就是元史与元代文学史的相对位置。

另一个特殊情况,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的。那就是中国古史的“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现象<sup>②</sup>。在我理解,所谓“南北对抗,东西交通”是指由南方、北方的不同文明的对抗性冲击(战争,掠夺)带来了华夏文明史的转机,比如匈奴与汉,突厥与唐,蒙古与西夏、金、宋;这种历史性的冲撞,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沟通:匈奴与汉的战争,具体的“战果”就是张骞“凿空”西域;唐与突厥的折冲战和,将东方文明远播中亚欧洲;蒙古(元)以几代人的与宋、金、西夏的搏杀,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事实上,十六七世纪的清(满洲)与准噶尔领主争夺西行通道控制权的“百年战争”,是新一轮的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由此是不是可以说,北方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下,实

---

<sup>①</sup> 《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66 年中文版)第五章“异族统治与朝代循环”。

<sup>②</sup> 据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47 页转引。

际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敛与外延？前人曾用“铁马秋风塞北”来与“杏花春雨江南”对应。元朝，起自漠北蒙古草地的“铁马秋风”，最终销蚀在锦绣江南的“杏花春雨”之中……

在元代，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比如，相对来说元代的妇女有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针对这一点，《至正直记》卷一“妇女出游”节开始即说：“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并进而说，他的亲戚那怀<sup>①</sup>为溧阳州同知，曾“燕集者数，一致外议纷纷，渐起‘变夷’之诮”。这种风气受到蒙古色目人的影响。“盖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在《至正直记》卷二“婢妾命名”节，还记录了元代的一则针对娶妓女为妻妾的江南谚语，说妓女是“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然而，从《青楼集》等书中可以获悉，蒙古色目人娶艺妓是比较常见的，对社会风气有明显影响。妇女的参与，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动因，而诗文也就因之更加生动煽情。但当时重视读书的社会风气仍然浓烈。《至正直记》等元代文献还提到，当时江南有这样一个谚语：“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达者致君泽民，穷则隐学授徒，亦能流芳百世”，在读书之外，是农、桑、工、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这也与蒙古色目人传统上的对手艺与匠人的特别重视不无关涉。——这些民谣就是民间的“诗经”。

元是自汉代以来惟一一个未明确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统一王朝，也是惟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统一王朝。“儒家”与“文字狱”，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没有文字狱，确实给人留下

---

<sup>①</sup> 《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13 页的原文作“邢怀”。但在卷一“徐州奇闻”节，开始就说“溧阳州同知唐兀那怀”（7 页）。

了深刻印象。元明之际人叶子奇这样指出：“宋朝有诗狱，诸儒之过。”<sup>①</sup>而这句话，就是叶子奇本人在明初受到株连，身陷大狱时说的。说这个话时，他最大的担忧是：“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sup>②</sup>

元世祖后期用回鹘人桑哥柄政，桑哥的败亡是元史重大事件。《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喻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元世祖说：“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没有怪罪词臣，但当庭为桑哥柄政时诬杀的杨居宽、郭佑平反，给还其家资<sup>③</sup>。元世祖根本不在乎“词臣”说过些什么，怎么说的。然而对立的双方：冯子振、陈孚，都是汉族、文臣、诗文家，他们真的在乎。

与此近似的另一则掌故，就更是意味深长。元世祖平定江南之后，派程钜夫到原南宋区域了解情况。程钜夫还朝时，向元世祖举荐了一批江南籍的文人，其中有宋宗室之裔赵孟頫。皇庆二年（1313），赵孟頫与色目人贯云石等一同进入了翰林院，出任“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职务。贯云石在任上优哉游哉，自称“年来职史，稍稍遐顿”，便有了闲心为元曲第一部总集《阳春白雪》写序。而赵孟頫在职谨慎小心，左右为难，还有人直接上书给元仁宗，说“国史所载，多兵谋战策”，属于国家核心机密，不宜使赵孟頫这样的人参与。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史无明言，但无疑不是蒙古色目人。可元仁宗不但不采纳，反而为此大

---

① 《草木子》卷四上。

② 《草木子》自序。

③ 这件事在元史中相当有名，不但载入笔记《投瓮随笔》，还见于《元史纪事本末》卷七，《元诗纪事》卷九等。

怒，并扬言要加罪说这个话的人，否则“无以戒来者”。“于是谤者始息”。这个事出自同样身在翰林的杨载为赵孟頫写的“行状”，所言必确<sup>①</sup>。问题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上述意见（敌国皇室亲属不能直接接触机密档案）并无不妥，反对使用赵孟頫者又何错之有？这足以说明重视文化的汉人与蒙古人的一个基本差异，蒙古人马上打天下，根本不把文人、文化当回事。

清代诗论家朱彝尊在其《静志居诗话》中特意提到：明初皇帝“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而元代有了汉人文臣，其实也就有了文字忌讳。元代进贺表文，有 167 个字不许使用，用了会触犯忌讳。元朝曾将这些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朱彝尊认为，与明初相比，“其法良善”<sup>②</sup>。这 167 个字，往往是“不吉利”的，但也有“仙”“梦”这类中性的。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与蒙古文字毫不相干。蒙古人将自己的名字音译成汉字，叫什么“丑”“驴”之类也并不在乎。

元的这种“气魄”，不仅是明，即便同是北方民族建立的金、清两朝，也不能与之比拟。元人的诗文，写到“胡虏”之处随时可见，元代的蒙古色目人为岳飞庙题诗成了风气，正因为如此，赵孟頫才大大方方地写出了他的杰作（也是元诗名篇）——《岳鄂王墓》。在比如清初，一个明朝皇室之后敢公开歌颂熊廷弼吗？贯云石是色目世臣，他的一首诗《筚篥乐》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但在清人著录之中，则成了“□□不受紫檀风”，顾嗣立《元诗选》就是这样用两个墨丁录出《筚篥乐》的。更有甚者，贯云石手书《筚篥乐》是流传有绪的元人书法，历来相当珍视。但

① 见《松雪斋集》附录。

② 见《静志居诗话》卷二“苏伯衡”节。朱彝尊的这则评论，不止针对明初，也是针对清代的文字狱而发。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元代之法“良善”。